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比利时】高华士 著 赵殿红 译 刘益民 审校

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

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

ANÇOIS DE ROUGEMONT, S.J.,
MISSIONARY IN CH'ANG-SHU
(JIANG-NAN)
STUDY OF THE ACCOUNT BOOK
(1674-1676)
AND THE ELOGIUM

【比利时】高华士 著 赵殿红 译 刘益民 审校
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

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

FRANÇOIS DE ROUCEMONT, S.J.,
MISSIONARY IN CH'ANG-SHU
(CHIANG-NAN)
A STUDY OF THE ACCOUNT BOOK
(1674-1676)
AND THE ELOGIUM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比)高华士
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3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978-7-5347-3858-6

I. 清... II. 高... III. ①经济史-史料-研究-常熟市-清
前朝②鲁日满-会计账簿-研究 IV. F1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3278 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

作 者 [比利时]高华士

译 者 赵殿红

审 校 刘益民

责任编辑 魏淑民

责任校对 何 力

封面设计 陆智昌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 行 **大象出版社** 发行部 电话:0371-63863551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次印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9.875

字 数 563 千字

定 价 41.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编译丛刊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主编 于 沛

(美) 孔飞力 王大庆 王 江 王晓秋 (法) 巴斯蒂夫人

(德) 达素彬 (俄) 米亚斯尼科夫 朱政惠 刘 东

张西平 (英) 吴方思 杨念群 赵世瑜 耿 昇 徐 浩

徐思彦 钱乘旦 虞和平 戴 寅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纪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

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录,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新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录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中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的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必须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文化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 年 5 月

出版说明

清代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的历史文献在清代的外文文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不仅研究西方汉学若不从此入手,就无法掌握和真正了解西方汉学的来龙去脉及其知识演化和变迁的内在原因;同时,研究中国明清基督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若不掌握入华传教士的相关文献,也无法进入其历史的内核。多年来,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停留在“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上,直接研究外文原始文献和档案的较少,翻译出版的史料也很有限,这或许是该领域的研究总是进展缓慢、鲜有创造的一个原因。

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大象出版社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合作,自1999年起组织出版了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丛书,从基本文献的翻译入手,分三个系列向国内读者介绍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本书系已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五”期间重点图书出版项目,目前已陆续出版十余种。在继续致力于这一书系组织出版的同时,为配合国家的清史文献的整理出版,我们将部分有关清代传教士著作和文献的译著,从这套书系转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编译丛刊”中出版,特此对读者诸君作一说明。

学术乃天下公器。清史纂修,世纪大事,我辈能参与其中,为之尽心,足矣!

大象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2004年6月



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文化协会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Katho-
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Belgium

本书在得到南怀仁文化协会的支持下,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策划,其翻译及审校工作亦得到南怀仁文化协会的帮助。

序言一

自 1982 年以来,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文化协会积极致力于对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的研究。其中,谭永亮(Patrick Taveirne)博士和古伟瀛博士、教授负责指导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中国传教史的研究;高华士博士则专注于研究南怀仁和 17、18 世纪的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协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八届中国天主教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自己的系列——“鲁汶中国研究丛书”名下出版了 16 本英文和法文学术专著及论集,亦在自己的另一个系列“怀仁丛书”(台北:光启社)名下出版了三本中文著作。刘益民博士则主要负责南怀仁文化协会与其他研究机构和研究者的交流与合作。

高华士博士的这本鲁日满研究专著的中译本得以收入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编译丛刊》,我们也备感荣幸。高华士博士是南怀仁文化协会的研究员,研究视野主要涉及 17 和 18 世纪低地国家的传教士。他本人是拉丁语专家,最初翻译南怀仁通信,随后经过一丝不苟的研究,逐个解决了所遇到的学术问题。1993 年,他首次出版了《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文献、翻译、注释和评论》(迪林根,1687 年,共 547 页),仅注释就有 200 页。在以后的每部著作中,高华士博士以不懈追求学术上的尽善尽美而为同行称道,这也使他成为今日学界最为优秀的南怀仁研究专家。2004 年,他出版了《耶稣会士南怀仁(1623—1688)和中华天际:南怀仁天文学著作的形成及其在欧

洲的传播和认同》，并因此在布鲁塞尔获得了基利斯奖^①。目前，高华士博士的计划是出版南怀仁的通信全集，并在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南怀仁的传记。同时，他也准备注释和出版安多（Antoine Thomas）的通信集。

在对南怀仁和安多的研究过程中，高华士博士发现了两份有关耶稣会士鲁日满的文献：一份是他记录收入和开支的私人账本，另一份是由耶稣会士 Aegidius Estrix 神父在鲁日满去世以后为他撰写的行谊。这些文献提供了一些引人注意的新鲜信息，高华士博士决定对其进行“简略之研究”。他本来打算在数月之内完成，但他从来不会进行肤浅而匆促的研究，对学术研究的敏锐使他接二连三地发现问题。最终，这个“简略之研究”成了洋洋巨著，他完成的是 800 多页的鲁日满研究专著，从而为相关领域的中西学者提供了另一份学术精品。本书的研究揭示了中国传教团体的财政状况、支付方式、收入来源、日常生活费用、一位耶稣会士一年所需费用等等。对账本的细致研究还揭示了传教团体的物质层面，如健康状况、医药护理、饮食、衣物等。从中我们还进一步了解了耶稣会士们的传教方式：重视利用各种书籍（包括教义书籍、教理问答、辩护书籍等）和图画作为传教工具。本书还对鲁日满及其同事们在中国的社会交往进行了研究，包括他们与中国官员、士人和普通民众的来往。充分利用西方档案馆中被尘封 300 多年的历史文献，忠实地再现历史事实，本书可以说是此类研究模式之典范。

高华士的研究表明，仍有很多隐藏于中西史料中的关于中国传教史的文献，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进一步激励诸多研究机构认真调查史料，对中国传教史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这也是我们南怀仁文化协会自 1982 年成立以来一以贯之的努力方向。我们

① The Price J. Gillis, 由比利时皇家佛兰芒科学与艺术学院 (the Royal Flemish Academy of Belgium for Sciences and Arts) 颁发, 奖励科学史和科学思想史领域优秀的学术专著。申请者不论国籍, 作品须以荷兰文或英文撰写。该奖设立于 1970 年, 每两年颁发一次。——译者注

的重点在于对来自低地国家的传教士进行研究,尤其是他们对建立中国地方教会的努力和对东学西渐的贡献。对南怀仁和鲁日满的研究既已展开,但在 17 和 18 世纪活跃于中国的来自低地国家的其他传教士,仍未见闻于中西世界,尽管他们也对中国的传教事业及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我们在此仅举数人,深望中西同道与我们南怀仁文化协会一起,对这些传教士进行深入研究。

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他在 1615 年出版了《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其中包括利玛窦的传教备忘录,被认为是准确报道中国情况的最早出版物。对金尼阁的研究相当重要,迄今仍无专著出现。金尼阁出生于杜埃(法国),在当时属于低地国家的一个地区,随后进入耶稣会比利时会省。他于 1607 年前往果阿,1611 年到达南京,在杭州和北京传教。后来他被派往罗马,向教皇寻求并得到使用中国语言进行宗教仪式的许可。教皇赐予他许多书籍,请他带到中国,这些书籍现今成为北京图书馆北堂藏书的一部分。金尼阁于 1620 年回到中国,在西安府建立教堂。后在杭州去世,年仅 51 岁。

柏应理(1624—1692),来自比利时梅赫林,在中国度过 20 余年后,于 1681 年被派往罗马申辩中国礼仪问题。他为教皇图书馆带回了许多中文书籍。在欧洲停留期间,他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这是首本以西文介绍中国儒学的书籍。他在法国路易十四国王、英格兰国王和罗马教皇等人面前,对中国文化大加赞扬。1986 年,南怀仁文化协会举办了柏应理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也是本协会举办的首次国际学术会议,但仍有许多工作没有得到开展,例如柏应理的信件就没有得到系统收集和研究。这些信件将是十分珍贵的史料。

卫方济(Francois Noel, 1651—1729),生于赫斯特鲁^①,至今没有任何作品对他进行研究。他于 1684 年前往中国,1711 年用拉丁语

① Hestrud,当时属于比利时图尔内(Tournai)教区。——译者注

翻译出版了《中国六大经典》^①。他在译文的序言中介绍自己力图“研究中国立法者的道德和政治哲学”。这份历史文献表明了当时的传教士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欣赏,包括中国的上帝观、道德体系、政治结构、农业状况以及教育情况等。

安多(Antoine Thomas, 1644—1709)生于比利时的那慕尔(Namur)。他曾前往果阿,试图从那里去日本,未果。1685年,他被派往北京帮助南怀仁,并被任命为钦天监副。他在1692年成功地促使康熙皇帝颁布容教敕令。吴尔铎(Albert d'Orville, 1622—1662),生于布鲁塞尔,1657年前往中国。1661年,他受耶稣会长上之命从西安出发,试图开拓一条通往罗马的陆路,以避免绕道好望角的漫长航程。他历时数月,经过西藏,翻山越岭到达尼泊尔,随后到达贝拿勒斯。最后不幸死于途中,年仅40岁。朱耶芮(Philippe Cazier, 1677—1722),生于梅嫩(Menen),1714年到达中国。他在广州附近照顾麻风病人达八年之久。他本人最后亦身患麻风病,于1722年终告不治。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物,如根特(Gent)的王以仁(Pieter van Hamme, 1651—1727);杜埃的史惟贞(Petrus van Spiere, 1584—1628);布鲁塞尔的万惟一(Willem van der Beken, 1659—1703)等等。这些传教士并非都像南怀仁和柏应理一样富于才干、声名远播,但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亦具有普遍性的代表意义和我们始料未及的多样性。

只有众多像高华士博士一样的学者和许多研究机构的共同探索,才能将上述历史人物从遥远的清代复活于今世。

韩德力(Jeroom Heyndrickx)
鲁汶大学南怀仁文化协会主任

^① 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三字经》。——译者注



序言二

清初江南天主教史的一幅真实画卷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清中前期天主教史的研究有了不少进展,特别是台湾清华大学的黄一农在对清初历狱、陕西天主教史研究方面成绩显著,湖北大学的康志杰对磨盘山教区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则是比利时学者高华士(Nöel Golvers)研究清初期天主教史的一部力作。

此书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是高华士先生基于鲁日满当年(1674—1676)在常熟时的原始账本而展开的研究。账本和入华传教士们在欧洲公开出版的其他著作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没有任何为取悦欧洲读者而做的那种护教式的描写和记述,也没有为在礼仪之争中获得教内和教外更多的支持而做的那种夸张和片面的描写。账本记载的是鲁日满纯粹的个人活动,他从未想到发表,而这恰恰保证了账本的真实性。这样珍贵的史料,据我所知,目前只发现了这一份,和鲁日满账本同样吸引人的是高华士基于账本所做的研究。我认为这本书是近十余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一本极为难得的好书。

这本书的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它为我们提供了清代经济史的第一手文献。国内学术界对清代经济史的研究十分深入,像全汉昇、李伯重等人的著作给我们

提供了1550—185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全景。而鲁日满的账本则主要记载了他的传教活动、他所在传教小团体的日常生活、他的经常性开支及其在苏州一带的十次旅行,内容十分广泛。正像高华士先生所说:“账本也是反映中国商品价格史及各种服务价格的一种材料,从这一点上说,它的内容又属于汉学的领域,更确切地说,属于所谓的‘康熙萧条期’中国经济学的领域。这份发掘不久的来自常熟的西文材料,由此可以充分补充当时中文材料的缺陷。”实际上一旦对账本展开研究,就必然考察当时中国江南的经济情况,包括当时商品和服务的各种市场价格、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率等。这样,内容已经超出了传教学的范围,我们必须将其放在当时清代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才能把握住这份文献的价值。

例如,作者根据鲁日满的原始记载,折算出当时的银和铜钱之间在常熟一带的兑换率,并根据这种兑换率的浮动看出了当时社会生活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写的:“在账本反映的时间内(1674年10月至1676年4月),一种深刻影响铜钱价值的政治局面是1674年4月21日(康熙十三年三月十六日)爆发于福建的‘三藩’之乱。战争的消息到达江南省,是在康熙十三年四月(1674年5月),市场上的铜银比率急剧下降。……从康熙十三年四月,即账本开始的前半年,1000文钱兑五钱银子;1674年接下来的数月 and 1675年,1000文钱只能兑四钱甚至三钱银子。这种状况持续到1676年,直到战争形势明朗,满族军队扭转了战局,时间是康熙十五年九月(1676年10—11月)。直到康熙十七年,铜钱才恢复到正常价值,例如1000文可兑换八钱银子。”

高华士先生还根据账本对鲁日满的日常生活消费做了具体的价格计算,由此我们可以对17世纪70年代的江南经济生活有一个十分具体的了解。

其次,对传教士传教生活的实际揭示也是这本书的亮点。迄今为止对清中前期的天主教史研究大都停留在一般性的历史描述中,特别是对传教士的具体传教情况缺乏细节性的描写。我们很难知道

一个传教士在中国如何生活,如何社交,如何传教,他们自己的灵修生活是如何进行的。该书是第一本揭示了传教士真实生活的书籍,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真实生命历程。

作者将鲁日满账本中涉及的日常生活物品做了逐一的分析,这些物品有:住房、大米、蔬菜、水果、肉类、奶类、鱼肉和贝类、糖果、酒类、器具等。通过这种分析,作者认为“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传教士的菜谱远比普通中国人丰富得多。按照闵明我的另一种说法,普通中国人的饮食只包括三类食品:豆腐、各种蔬菜和大米。耶稣会士的菜谱中还包括各种肉类、鱼类甚至贝类,还有蛋糕和点心”。

高华士统计了鲁日满在 1675 年一年的花费共 126.6688 两银子。那么,传教士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戚印平在《日本耶稣会史研究》中谈到在澳门的耶稣会传教团是通过和日本的商业贸易来获得利益的。但这本书中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事实,即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团一开始是分享这种商业利润的,但从 1669 年后就不再得到这一资助。因为,当时的中国副省长何大化明确反对这种商业活动。从账本中可以看出,鲁日满的经济来源主要是:(1)房租,当时鲁日满有三所房子出租;(2)土地,账本记有鲁日满的两次土地交易。同时,这些土地也是传教士们的生活来源,他们所吃的大米、蔬菜和一些农产品大都是自产的;(3)借贷利息;(4)来自在澳门的日本耶稣会省所发的每年 60 两银子的津贴;(5)经济捐赠。

再次,通过鲁日满账本中所记载的与各种人物的交往,也使我们看到了传教士们的布道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基本情况。例如,账本中曾提到鲁日满两次拜访在苏州的江南巡抚,并拜访知县。同时他和当地的文人们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些文人既有一般秀才、举人,也有在当地有影响的文人墨客,例如江南著名文人诸际南、著名画家吴历等。这反映了耶稣会的基本传教路线,但账本中记载最多的并不是文人,而是平民,从舂米工到教员和钟表匠,包括从事不同的手工、脑力及其他琐碎工作的各阶层人士。正如书中所说:“总而言之,账本反映了许多种类的职业,这里的职业全部由男人从事,他们

有各种各样的技能。这反映了鲁日满及其传教生活的真实层面,没有任何保留和矫饰,这些在其他材料中是无法看到的。”

这本书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现名“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下同。——编者注)和比利时南怀仁文化协会合作的研究项目,译者赵殿红又是专治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年轻学者。这本书的翻译出版表明我们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必须从中文文献和西方文献同时入手,必须对传教士和中国文人(无论是信教或反教的)同时加以研究。对我们来说,不仅要认真挖掘中文文献,同时也要注意西方文献的翻译和研究,相比之下,从中国的研究状况来讲,对西方文献的了解要相对弱些,许多基本文献我们并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文献进行梳理和翻译是我们整个学科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了解那些懂中文的汉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也要了解那些非汉学家的西方学者们的成果,我们需要对西方各个传教修会有关中国的重要文献进行梳理和研究。鲁日满的账本就是一个典型,它原本是一个纯粹的传教学文献,但高华士先生做了很好的研究,无论是在汉学方面还是在传教学方面都很有新意。

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南怀仁文化协会的合作还在继续,我们希望在今后还会不断有此类的优秀译作问世。

张西平

2004年10月12日初稿

2004年11月15日定稿于游心书屋